

程瑶田《莲饮集》的发现

龙 松

一、程瑶田及其著述

程瑶田(1707年或1725年——1814年)，字易畴，又字易田、伯易，号让堂、葺荷、葺翁、葺郎，安徽歙县荷池人，清代乾嘉时著名的考据学家，皖派的杰出代表人物。程瑶田自幼即好学深思，“平居鸡鸣而起，燃灯达旦，夜分就寝，数十年如一日。”（民国修《歙县志》卷七《人物志·儒林传》）又师侍当时著名朴学大师江永，深得其治学精神，与戴震、金榜同为江永的得意门生，于义理训诂、制度名物、声律象数等均有所研究，对《仪礼》尤有独见；每一撰述必旁搜曲证，不为他人传注所束缚，为戴震、钱大昕、王念孙等人所推重：王念孙与之商榷疑难四十余年，深服其“立物之醇，为学之勤，持论之精，所见之卓，一时罕有其匹”。（王念孙《果裸转语记跋》）戴震亦尝“自谓尚逊其精密”。（《清史稿》卷四百八十一《程瑶田传》）

程瑶田于科举屡不得志，曾九应乡试，至乾隆三十五年（1770年）四十五岁时方中举人，选嘉定教谕，任太仓学正，后辞官不做，隐归故里，专门于学。一生著述不辍，年老目盲犹口授儿孙，所著有《仪礼丧服足征记》、《禹贡三江考》、《九谷考》等二十余种，百余万字，汇刻在《通艺录》内。另有《让堂诗抄》十八卷藏于家，未曾刊行。这些著作考核精确，训释有据，令人信服赞叹。“先生以穷理尽性、格物致知之学发为文

章，皆根极理要，拔正邪僻，无片言只语踳驳；十三经注疏贯穿于胸中，又博搜三代以来桓碑彝器、篆籀分隶之书，莫不考据精确，而其归皆折衷于六艺。”（汤文隽《送易畴先生归新安序》，载《通艺录·亦歧录》附录）

程瑶田不仅于考据学方面成绩卓然，在文学方面也颇有造诣，其诗文即屡为桐城派文学家巨擘刘大櫆所赞许，刘对程瑶田诗文的总体评论为：“五言得力渊明，最为高妙；七言从古乐府来；律诗取迓宋人；绝句逼真江西宗派，尤近涪翁矣。”（稿本《莲饮集》卷首）但是，纵观程瑶田遗著及有关其著作的著录，其诗集仅有《让堂诗抄》、《莲饮集》、《濠上吟》、《莲饮集濠上吟稿》四种。由于这几种诗集均未刊刻，故其详细内容鲜为人知，但就其名称而言，它们似乎又有重复之处，有待作深入的考订。

二、有关《莲饮集》的著录情况

程瑶田的四种诗集，除《让堂诗抄》见于诸家转录，未见详细的原始记录外，另三种诗集却有如下较为明确的文字记录：

第一，由程瑶田自编、刊于嘉庆八年（1803年）的《通艺录》，于目录中分别列有《莲饮集》与《濠上吟》两部著作，但均有目无书。

第二，道光八年（1828年）修的《歙县志》于卷九《艺文志》中著录程瑶田之作有《濠上吟》。

第三，刊于民国二十二年（1933年）的安徽丛书本《通艺录》增有《莲饮集濠上吟稿》一书，但从拟题来看，似乎把《濠上吟》作为《莲饮集》内容一部分。

第四，民国修《歙县志》卷十五《艺文志》中著录程瑶田之作有《莲饮集》，但无《濠上吟稿》。

不管这些著录的根据如何，通常所见的程瑶田诗集只有安徽

丛书本《通艺录》中的《濠上吟稿》寥寥一卷真实内容而已，《莲饮集》也只是有名无书，其或散或失也不可详知，《濠上吟稿》到底是不是《莲饮集》中的一部份仍是疑问；而《莲饮集》、《濠上吟》、《莲饮集濠上吟稿》是不是十八卷《让堂诗抄》中的一部分内容更是谜中之谜。

但是，根据以上著录可以推断：《莲饮集》是确有其书，而且程瑶田自己还作有《莲饮集自序》一文，载在《通艺录·修辞余抄》中。文中写道：“余方录余所为时文，未有名也，客请以‘莲饮’为名。余曰：‘淡则有之，若于此而求其味之所在，恐不可得也。’徇客之请，而姑以名之可耳。”由此可见，程瑶田确曾自编一本名为《莲饮集》的“时文”集。但二百年来，此书一直沉落不明，更未见刊刻，成为一些研究者心中的憾事。

三、稿本《莲饮集》的发现

笔者在探讨程瑶田的考据学成果时，按前人的著录，又根据1961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安徽文献书目》的有关线索：《莲饮集》四卷、程瑶田著、稿本二册、安徽省博物馆藏。在整理我馆所藏古籍文献资料时，真得发现了此书，心中惊喜万分，沉没近二百年之久的程氏著作终于又重见天日！

该书二册，线装，封面封底均以绢包。封内装帧采用金镶玉裱衬法，即把用黄竹纸所抄的内容，再用白色宣纸衬裱起来，天头地脚均露出二厘米左右的宣纸。由于纸的颜色为一白一黄，故称其装帧为“金镶玉”。装帧后的该书长36.3厘米，宽16.4厘米，每半页9行，行25字，上册27页，下册33页。在该书两册的封面上，均有近代安徽藏书名家许承尧题写的书名，其题为“程氏莲饮集写定本”下钐其“不疑精舍”朱印。

题名中，许承尧把该书的版本定为“写定本”，而不是稿本或抄本。从整个内容的字迹来看，显然不是程瑶田亲手抄录的，

但其中有不少红笔更改的地方，笔者以之与我馆所藏的程瑶田手迹如《程瑶田手抄唐诗三百首》等加以比较审核，确定这些朱笔都是程瑶田的手笔。也即是说，程瑶田在请人抄好该书后，自己又亲自作了审阅，对其中的错误或认为不妥的地方又用红笔作了改定。故笔者据此将此书定为稿本，因为在目前的版本学界中，也有将非作者自抄自誉，但经过作者亲自审核与勒定的抄本定为稿本的。

对该书作了题跋的有两人，一个是许承尧，另一个则是自称“湖田后学”的吴得英（生卒不详，安徽歙县人，室名为“湖田草堂”）。而从题跋的次序与年代来分析，显然许氏是在吴氏之后获得此书。

吴氏的题名、题跋共有四处：第一处在原线装的封面上，于毛边纸上题“程易田先生莲饮集诗钞四卷”十二字，正楷，下钤“湖田草堂”朱文印。第二跋在接页上，题有“莲饮集诗钞易田先生著”十字，行草。第三跋在第二跋的右侧，叙述了该书所得之原委，其题为：“癸亥（据笔者查订，当为1863年）乱后，于旧书堆中获此本及《松莲诗抄》，急购而藏之。□识。”第四跋在全书最末一页，内容较详，计139字，其文为：“右《莲饮集诗抄》四卷，计诗二百七十三首（实为二百八十三首，系吴氏累加有误——笔者），同邑程征君易田先生著。邑《志》载先生著有《濠上吟稿》，集中编入第二卷，盖此为先生手定本也。读先生自序，尚有‘今时文’（时文有刻本），集中不载；或分订两本，已佚其一。癸亥寇乱后，获于市上。先生著述已刻有《通艺录》，不知此集当年曾刊雕否？同日并获郑冈集先生《松莲诗抄》一卷，亦影抄本也。湖田后学吴□谨识。”该跋字体为行草，在文末落款的左边钤有“湖田草堂”之印。

吴氏在1863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，于旧书摊中偶获此本，以为至宝，“急购而藏之”，且认为此本为程瑶田“手定本

也”。

许承尧于吴氏之后获得此书，并对它进行了重新装帧，封面、封底的绢装即他所为。许氏的题跋共有四处：第一处即绢封所题。第二处在原装封面接页的背面上，其文为：“先生诗只《濠上吟》一种，曾刻入《通艺录》，余皆未刻。此书发现，如获宝藏；意味深厚，咀玩不尽。可喜之至！丙戌夏芑叟病臂书。”“芑叟”为许承尧的号。在此跋落款的左边，钤有许承尧“静庵寓意”朱文印。许氏的第三跋在程瑶田《莲饮集自序》之后，主要评述程瑶田以“莲饮”名书的意义：“以‘莲饮’自状其诗，先生于理咏亦殊善标举矣。有德者必有言，诚然不入时文，尤佳叹莲饮味全也。丙戌夏芑叟病臂书。”此落款下方也钤有“不疑精舍”朱文印。许氏的第四处题跋在卷四末页，仅9个字：“卷末记数是先生手定。”其下钤有其“霁堂”朱文印。是本《莲饮集》每卷末，都有朱笔正楷书写多少首字样，许氏认为这些记数字样是程瑶田手笔，这大概是他把该集定为：“写定本”的主要依据。

该书的印章颇多，除上面于封面、题跋之后所钤吴氏、许氏之印外，在《序》、《评论》及每卷之首均有钤印章，如“静庵寓意”、“湖田草堂”、“静庵”、“霁堂”等。

总之，无论是从著录情况，还是从此本的题跋以及其中经过程瑶田自己更改的朱笔字迹来考订，都可确定此本《莲饮集》是真本、足本、定本，而且还是一直未加刊行的稿本。因此，对它的内容作一介绍就很有必要。

四、《莲饮集》内容概况

稿本《莲饮集》不但比安徽丛书本《莲饮集濠上吟稿》多出3卷，且录诗283首，是后者所录8首诗的35倍，字数也有近8万言之多。即使是《濠上吟稿》，该本也有52首，比安徽丛书本多

出44首，且后者的《宿长淮卫》只录后半部分。由此也可推知，《濠上吟稿》并非程瑶田诗集的足本，只是《莲饮集》中的一部分。因此，即使从内容份量来讲，《莲饮集》的发现与整理对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委员会目前正从事的《程瑶田全集》的搜集与整理，确有重大突破；况且程瑶田于诗颇有造诣，其学术价值更不待言。但是，限于篇幅，笔者无法将二、三百首诗尽殚读者，只能介绍其大略。

稿本《莲饮集》的编定次序是这样的：首为与程瑶田同时的淳安人方粹然之《序》；次为程瑶田的《莲饮集自序》；再次为当时各名家对程诗的有关《评论》；再次即为正文。正文的第一卷为《广陵吟稿》，有诗71首；第二卷为《濠上吟稿》，有诗52首；第三卷为《楚游吟稿》，有诗63首；第四卷为《池上吟稿》有诗97首。

方粹然在《序》中称程瑶田诗为“如玉在莹，净不容唾”、“如木叶微脱，石气自清；味外之味，津涌玉池。”把程诗的清新流畅，爽口淡味评述得十分妥贴，但又指出：“然而大音不谐里耳，山中白云不堪持赠。易田固不肯与当世之以诗鸣者争一时之坛坫，唯是偕吾乡二三子，钟鸣玉应，淡与泊相遭，吾意中之诗乃竟冲然得其左契矣。”由此可知，程瑶田的诗风在当时是有独特之处的，似乎与“诗人之诗”有格格不入的一面。

是本《莲饮集自序》在总体内容上与《通艺录·莲饮集自序》无多大区别，但在用词造句上微有不同，前者稍显粗糙，后者却明显含有雕琢的痕迹，显然是作者在收入《通艺录》付梓时又作了进一步润色。如果把两文作一全面的比较，细心的读者就会发现其中一点很重要的区别，即将稿本中的“余方录余所为诗歌及今时文，无以名其集，因取而名之，而书之以为叙”中的“诗歌”二字删去了，成为“余方录余所为时文。”《莲饮集》明明是一部诗集，此《序》也是为此诗集而作，为什么程瑶田在该

《序》最终付梓时要将“诗歌”二字删去呢？只含糊其词地说：“时文”，似乎《莲饮集》是他的一部文集。笔者觉得程瑶田之所以在付梓时将《序》中仅仅提到过一次的“诗歌”二字删去，是因为他不想使自己在世时看到这部诗集出版，在他自编的《通艺录》中也仅列为附录，且有名无书。程瑶田为何不想把这部业已编定的诗集公诸世人呢？笔者推测有两个原因：第一，也许是程瑶田的诗风及诗歌理论与当时所流行的颇有不合之处，正如方粹然在《序》中所言，不想在当时诗界争一席之地，故决定不予付梓。但《莲饮集自序》是“文”，已收入《修辞余抄》中，其中又明述为诗歌结集而作，这样一来不就矛盾吗？故干脆将“诗歌”二字删去。第二，也许程瑶田受乾嘉考据学之影响，认为自己的学术成就主要是在考据训诂方面，于诗歌只是“间以余事”而为之，不值流传散布，故《莲饮集》终究未能收进《通艺录》内，仅其“抄本”在社会上辗转流传，世人罕能见之。

就《莲饮集》内容而言，或为和答而作，或旅途有感之作，或游景观色而作，或咏物寄思，或悼古寓今，都是程瑶田内心感受的抒发，从中不仅可窥见他的诗学造诣、思想动态；而且该集的全面整理与研究，还对程瑶田的交游行踪及生平经历的研究提供了较准确、清晰的脉络。因而，《莲饮集》的发现与整理研究，将是一件切实而有意义的工作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安徽省博物馆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曹月堂）